

绪 论

本卷主要论述中国军事后勤制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和规律，时限起自夏朝 迄于当代 上下四千余年。

一、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的研究任务

军事后勤制度 是通过筹划和运用人力、物力、财力 为军事力量建设和作战提供财务、物资、技术、交通运输、卫生等勤务保障的制度 是军事后勤工作和组织赖以建立决策、执行和运作的一整套体制和机制的规范体系。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产生国家、军队以及国家之间、

民族之间、地域之间、阶级之间、集团之间诸种类型的战争以来，军事后勤制度就应运而生，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民族、地理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变动而日臻丰富和完善。

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历史上发生过不计其数的战争，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其中包括军事后勤制度建设的经验。早在先秦时代，孙子就提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①的经典性论断，对后勤和后勤制度给予高度的重视。此后历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无不将军事后勤保障置于战略性的地位，“故军以粮为本，兵以奇正为始，器械为用，委积为备”^②，紧抓不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制度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谱写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光辉篇章，为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又为新时期军事后勤制度的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当代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幻，综合国力的增强，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对军事后勤制度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研究自古迄今中国军事后勤制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揭示其特点和规律，正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以作为新时期现代化的军事后勤保障体制和制度建设的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研究无疑具有审视过去、观察现在、瞻望未来的巨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容忽视。

二、中国军事后勤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军事后勤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

过程，具有十分鲜明的历史色彩和民族个性。尤其是中国古代和当代的军事后勤制度，更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突出的特点。在这里，只能做一个鸟瞰式的回顾，详细情况将在本卷各章中展开具体论述。

从夏代开始，我国由原始社会正式进入阶级社会，建立起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商和西周相继而起，都是奴隶制的统一王朝。与国家机构由产生到逐步完善、军队不断增强和扩大这一过程同步，包括后勤制度在内的军事制度也在日益形成和发展。夏、商、西周时期，是古代军事后勤制度由草创到基本定型的阶段，其主要内容是：偏重后勤的某些职官和部门已经出现，但尚未专门化；族的组织是重要的后勤管理单位；粮秣辘重的获取和存留，逐渐形成初具规模的委积制度；作为军费来源的军赋制度呈现出萌芽状态；兵器由以原始的木石骨蚌兵器为主过渡到以青铜兵器为主，武器装备的制造管理越来越体现出集中性；对于军用马牛的畜牧、管理及选择，逐渐形成一定制度；驿传初具规模，通讯联络手段由原始单一逐渐向多样化过渡。这一时期军事后勤制度的萌芽、形成和基本定型，为春秋战国军事后勤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诸侯争雄，大国称霸，战争连绵不断的时代，也是社会急剧变革，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时代。军事后勤制度不能不受社会大变动的影响而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时期，古代军事后勤制度由初具规模逐步走向成熟，其具体标志在于：各大国的后勤职官和部门均向着专门化转变，中国古代的后勤职官和管理系统臻于全面和成熟，后勤管理部门的统属关系得到强化；粮秣军需的委积和供给手段日渐丰富，军赋制度由成熟阶段走向与租税合流的阶段，租税收入至战国时期实际上成为军需的主要来源；武器装备有长足的进步，弩机在军中普遍使用，铁兵器明显增多，攻防器械朝多方面发展，战国时期兵器制造国家化、管理严

格化；马政和驿政逐步发展，通讯联络制度形式多样。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从一种社会形态跨入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转变，不仅褪尽了原始色彩的残余，而且开创往后两千年封建后勤制度的先河。

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汉承秦制而又有所发展。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的军事后勤制度萌芽和形成期，那么秦汉时代就是其确立期，其主要标志是：在皇帝的统御下，由国家财政主管机构负责军费的筹措和供给、军需物资的储备和转输；秦和西汉初，铜铁兵器并用，西汉中期以后逐渐以铁兵器为主，钢制兵器也逐渐增多，武器装备的制造、保管和发放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马政也设立高级的职官专门负责，军马的牧养有较大的发展。可以说，秦汉时期奠定了往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军事后勤制度的基本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战乱持续不已，自然经济加强而商品货币关系衰落，许多原居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以骑兵野战作为“威制诸夏之长策”。这一时期的军事后勤制度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点及某些‘胡汉杂糅’的色彩。其主要特点是：中央政务机构由三公制向三省制过渡，度支尚书成为主持“军国支计”的最高管理机构，但又存在其他许多分管军事后勤的机构，事权有所交叉，除正税、杂税和横调外，屯田收入在军粮来源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畜牧业原是入主中原的许多少数民族的基本生产部门，骑兵又是其军队主力，军马牧养十分发达，驿、传、邮的逐渐合一，使军事通讯联络制度由分散向集中的方向演变。

以唐中叶为界限，隋唐时期可划分为两个阶段。隋和唐前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藩镇割据，战祸

连结。隋和唐前期的军事后勤制度可谓古代的楷模，前一时期军事后勤系统中许多缭绕不清的现象得以厘正，政务机构、事务机构、审计机构、监察机构层次分明，事权集中，具有颇高的行政效率。均田制的推行，社会经济的繁荣，为军费、军粮的筹措和武器装备的生产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政府关于军费的支用建立了严密的财务管理制，道路通畅，仓储完备，驿传广布，法规完备，管理严格，使军事后勤运营的各个环节既有序又有效。安史之乱后，尤其是到了唐末，政治上的混乱，经济上的衰落，使军事后勤的运行机制发生梗阻，原先层次分明、职能高效的局面也丧失殆尽。

宋太祖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全国。北宋王朝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以臣僚分权、以文制武、养兵防患为基本国策，为其军事后勤制度打上了明显的历史烙印。其主要特点是：后勤管理机构比前代明显增多，中央的后勤管理机构众多而繁复，地方有些机构又与中央交叉，在形式上叠床架屋；军费不少由内库支出，由皇帝亲自决定；扩大军费来源，经总制钱因军费所需而设，南宋时发展为基本税之一种；以有价证券和纸币支付部分军饷，并用以委积粮秣；和余粮草成为日益重要的筹措军粮的手段；火药兵器出现并逐渐为军队所使用；大规模官营兵器工场出现，工匠的身份和民族成分多种多样。

与宋对峙的辽、西夏、金都是少数民族政权，他们最初都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经济形态、以部落为社会基本组织单位，其后勤制度有很大的相似性。与宋朝的接壤和对峙，两种文化在相互碰撞中发生越来越大的融合，使辽、西夏、金的后勤制度兼综其部族和中原的双重特色，主要表现在：后勤管理机构由部族管理体制蜕变为政府机构，但仍保存民族分治的某些遗留；粮秣军需的委积补给，渐由以掠夺方式为主向多渠道筹措发展，军队粮钱和武器装备，亦渐不

以自备和掠夺为限，金朝还确立了给赏和月例钱制度；传统兵器中，铁甲具有一定优势，火药兵器在金朝推出了新的品种；马政普遍受到重视，发展马群和扩大马数的形式比较多样；驿传的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

元代的统治者既能兼蓄并收其他民族之长以济己之短，又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保留着本族的某些落后因素。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既融合又冲突的复杂情况，对军事后勤制度发展的影响既有正面的积极的，又有负面的消极的。其主要表现是：蒙古色彩的后勤管理体系与中原传统官制并存，形成后勤管理机构的丰富性和多元化；对北方和南方人民采用不同的赋税制度，屯田制度出现新的内容，正贴户备装制度确立，海运军粮具备一定规模，法典中关于仓储的规定很多；火器制造水平在当时居世界领先地位，武器制造水平进一步集中化和专业化，武器的管理制度体现出“蒙古本位”的观念，马政亦掺入民族歧视色彩，驿传制度内容丰富却又弊病严重。

明代在政治上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分割军政与军旅权限，宦官权力日益膨胀；在经济上，商品货币关系较前有显著的发展。其军事后勤制度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的综合总结，走向更加成熟的阶段。主要特点是：后勤管理机构比前代更严整、更完备，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府到军队，各种机构环环相扣而又层级分明；监察机关对后勤管理工作的监察乃至直接管理作用比较明显；粮秣的委积和军饷的筹措形式更加多样化；火器的使用规模超过前代，出现火器部队和冷兵器与火器混编部队；民养官马包括户马、种马和寄养马，是明代马政的主要形式之一；驿站近 2000 处，规模空前，形式多样，驿站和由其联贯的驿道遍布全国，但无论马政或驿传制度的弊端丛生，反映着明代政治的日趋腐败。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间的公元 1840 年又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时区分界线。其军事后勤制度处于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制度的最后阶段，并逐渐向近代军制转变。主要变化表现在：后勤管理体系由重皇权转变为重洋务；军费筹措由重赋税转变为兼重关税与厘金，军费开支由以发饷为主转变为兼顾购置西洋军火；武器装备水平由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进入火器时代；交通通讯制度由以驿站为主转变为利用铁路、电报等。这些变化在清代后期逐步实现，有的只是刚刚起步。清代军事后勤制度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具体反映了中国由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向被迫开放门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化，既显示着包括军事后勤制度在内的古老封建主义制度的没落，又表现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

武昌起义的成功，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民国建立不久，其领导权即为军阀所篡夺。在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三个时期，军事后勤制度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继承了清政府的军事后勤制度，时间短暂，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少改革。北洋政府的军事后勤制度实际上也是清末北洋新军后勤制度的继续，但又适应当时的情况作了若干调整。其间较为突出的改革是 1922 年张作霖进行的以军需独立和统一补充为主要内容的军需整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军阀部队把军需视为主官的“私人账房”，弄虚作假，中饱私囊的现象。1923 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军事委员会下设“后方勤务部”由此而形成了“后勤”的概念以及与之相连的实体。国民党政府先后成立后方勤务部、联勤总司令部，使后勤体制更加严密、统一，尤其是仿效美军建立的联勤制，使三军分供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统一供应的保障制度。不过，在国民党政

府时期，由于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的存在，再加上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军事后勤制度始终是统一中有独立，独立中有统一，只是各个时期两者的偏重有所不同。

南昌起义的爆发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创了革命军队和红色政权的斗争历史。革命军队建立了自己的后勤制度，并让它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其后勤保障体制，是先后以农村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为依托，以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为主，分别由各地政府和部队组织，独立实施保障；在后勤组织体制上，则是机构设置不断完善，各级机构的职能划分和相互关系逐步明确，各项工作制度陆续建立，从而使后勤系统得以有效地运转。革命军队和红色政权军事后勤制度的建设，在种种困难的条件下，提供了必要的后勤保障，保证了人民革命战争取得伟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时期。与此相适应，后勤工作由分散转为集中，建立了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统一保障，上下结合，综合配套的保障制度，从而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这就是：“军队所需的装备物资由依靠人民支援和取之于敌发展为主要靠国家集中统一供应；由单一的陆军后勤发展为陆、海、空和导弹部队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后勤；由组织供给、卫生保障发展为组织多种专业勤务的综合保障；由比较简陋的保障与指挥手段发展为比较现代化的保障与指挥手段；由单纯的组织后勤保障的低级阶段发展到‘指挥战斗，组织供应’的高级阶段。”^③近年来，为了适应我国实行经济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制度经过深化改革，已成功地摆脱了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逐步进入了铸造军民兼容性“大后勤”的良性循环轨道，为巩固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提供了

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的发展阶段性

回顾中国军事后勤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这一制度既古老而又充满着青春活力。它起源于四千多年前，历史可谓悠久绵长，它又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民族、军事等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至今仍保持着不断发展与改革的勃勃生机。自古迄今的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呈现着明显的发展阶段性。如何划分这种发展阶段性，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标准。有的学者把它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有的学者则划分为冷兵器时代、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火器时代和机械兵器时代^⑤。笔者采用后一种时代划分，其根据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作战工具（即武器装备）的发展，是军队整个组织机构不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⑥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明确的论断：“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⑦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军队整个内部组织及其相互关系，当然包括军事后勤制度在内。

自夏朝至隋唐五代，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冷兵器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制度由萌芽、形成、定型到成熟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保障内容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供给粮秣、衣甲、兵器、舟车、军马，而以粮秣为大宗。冷兵器经历了石器—青铜器—铁器的发展过程，其使用寿命长，有形损耗少，勿须经常大量地补充，而粮秣为每不可或缺的生活消费资料，需要量极大，政府依靠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和组织大量的人力、畜力、车船转输各地供军。交通道路和仓储

制度成为后勤保障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办屯田则是就地保障军粮供给的补充手段。从物资来源看，虽然士卒自备衣粮和部分武器装备，直接征用民间的财物作为军资，是这一时代后勤保障经常采用的手段，但主要还是仰赖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主管军事后勤的机构也就是政府的财政主管机构，如汉代的大司农、魏晋南北朝的度支尚书、隋唐户部尚书下属的度支司。军队中是由中央委派的财政官员或军队长官主管其后勤保障，一般不设专职的后勤机构。武器装备和交通运输工具的生产和供给，也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主管，军马则由中央政府在各地设置牧场牧养。从整体上看，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军事经济已经在某些生产部门（如官营武器制造业、车船制造业、军马牧养业以及军屯）中立足，但作为军事后勤保障的基础仍然是以赋税、徭役和直接征用等方式取之于生产农产品和纺织品的小农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生产。

自宋代至清中叶（公元 1860 年前）是中国军事史上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改革和发展，武器装备在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后，由于技术水平停滞不前，从而开始落后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时代。粮秣和冷兵器虽然仍然是军需物资的主要内容，但火药、火器已逐渐大量使用，这就改变了军事手工业生产的结构和规模，军事消费的传统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某些变化，武器装备的开支在军费中大幅度上升。这一时期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货币因素在军费支出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以有价证券和纸币支付部分军饷为前代所未有，和杂军粮也较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军粮的重要来源；出现了商人入中边粮和屯田的新方式（商屯）；军事工业中雇佣工匠的人数愈来愈多；军马日益增多地购自市场。

当然，对于这一时代由火药、火器的使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军事后勤制度的变化也不能估计过高。军粮的储运和供给、军屯和交通运输方式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军粮的基本生产者仍然是小农，商品经济的某种程度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取代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即使是火药、火器大量使用于军队，并出现了火器部队或火器与冷兵器混编的部队编制，但由于当时的火器为手工业制造，使用黑色火药，技术性能不高，发射速度慢，射程短，威力小，还不能取冷兵器而代之，冷兵器仍然是军队的主要武器。至于这一时期的军事后勤领导体制，更浓郁地保留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特色。

自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辛亥革命胜利，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火器时代，也是中国军事后勤制度由古代跨入近代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明显标志是冷兵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旧火器也日趋废弃，军队大量使用新式火器。新式火器，除外购外，开始进行仿制和自制，由此而兴建大型的军工厂，武器生产开始由手工业生产向机器生产过渡。在军费中，用于军人生活费的开支在比重上进一步下降，枪支弹药费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交通运输改变了几千年来人扛马拉木质舟车运载的旧面貌，铁路的修建和新式轮船的使用大大改变了军需物资转输和供给的条件。在医疗救护方面，一改过去只使用传统方法的旧套路，引进西方医学，特别是野战外科医学，并把军事医疗机构编入军队序列，部队配备养伤病床和各种药品，对伤病员及时就地抢救，战后送就近医院治疗^⑧。在甲午之战后编练的新军中设立专门的后勤职官，如各镇有正军需官、正军械官、正军医官各一名，各标设正军需官、副军械官各一名，各营设军需长、军械长、军医、副马医官各一名，构成了自上而下、分级分层的后勤管理序列，其长官均为专职，不再由军务长官兼任。这一时代

的军事后勤制度承上启下，政治制度的滞后使其不可能跳出封建主义的窠臼，“西学为用”又为其抹上了一道薄薄的近代化色彩。

自辛亥革命以后，开始了中国军事史上的机械兵器时代，中国现代军事后勤制度也由起步、形成到日益发展、完善。虽然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经济仍然十分落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又极为腐败，所以现代军事经济的发展非常缓慢，从而给后勤保障制度的建设蒙上了层层阴影。这一时期武器装备开始向自动化、制式化、机械化方向发展，新式马克沁重机枪、自动步枪、自动驳壳手枪大批装备部队；1935年开始组建坦克部队；飞机、汽车用于军事目的的数量日益增加。这些新式武器大多可以自制，但坦克和装甲车基本依靠进口，飞机、汽车的生产量和零部件国产化程度都不高^⑨。北洋军阀的军事后勤制度基本因袭北洋新军，国民党政府模仿美国，逐步建立起适应机械兵器时代的现代后勤保障体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其创建初期，军事后勤制度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而带有自己的特点。至1939年军委设立总后方勤务部，保障人民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进行的后勤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制度日益完善和提高，并且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勤管理体制和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后勤制度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变化，一个适应当代国内外形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军民兼容性的“大后勤”体制已经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正在顺利地运转。

四、加强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的研究

中国军事后勤制度的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记载之详备，在世界军制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应当十分珍惜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它在国防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于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历代兵家和学者曾经进行过有益的探讨。例如南宋学者陈傅良在其所撰《历代兵制》一书中逐一评述西周至北宋军事制度的史事和优劣得失，内容即涉及武器装备、兵农关系、戍边屯守、服制饷章、马政厩库、供应军需等后勤保障制度。王应麟撰《玉海》，专设“兵制”一门，共 16 卷，对包括军事后勤在内的军制史研究内容范围进行了具体概括：“历代兵制沿革，或出于民，或考其成丁、归农之限，耕战、部伍之法，调发、教阅之节，屯戍、替易之期。或出于兵，则考其兵民之分自何时兴，其部伍调发、廩给之制，历代之兵内外轻重之势，用兵道里之远近，历时之久速，形势之利害，粮食之难易，将权之专杂，军律之得失，皆得详考。”其中涉及军事后勤制度的即有“屯戍”、“廩给”、“粮食”等。元代脱脱主持编修《宋史·兵志》12 卷，在其归纳的八项军制中，廩给、屯戍、器甲、马政占了“半壁天下”。此外，在古代还有多部军制专著问世，如明王守仁辑《兵志》一册，清金德纯撰《旗军志》一卷，鄂尔泰主修《钦定八旗通志》250 卷等，也无不涉及军事后勤制度的内容。

近代以来，随着包括军事后勤制度在内的军制的不断改革，有关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到了本世纪的 20~40 年代，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热潮。短短几十年间，涌现了一批军制史的研

究者，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出版了数十部专著，其中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有关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的问题。其中 陈寅恪、唐长孺、何兹全、谷霁光、岑仲勉等老一辈学者关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兵制的论著和罗尔纲关于清代兵制的论著至今仍是研究者的必读之书。

建国以来，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由地方的和军队的学者合作进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军事后勤制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势头，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可喜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出版了《中国军事史》兵器卷和兵制卷、《中国古代军制史》、《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中国历代百家论后勤》及《军事后勤学》、《国家军制学》以及熊德基、黄今言、王曾瑜、史卫民等学者关于断代军制史的著作，其中或设专章专节或在论及后勤保障问题时比较具体地阐述了中国军事后勤制度的发展历史；(2)出版了白钢主编、十余位学者执笔的 10 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著作，其中论及历代的行政体制和财政管理制度时涉及军事后勤制度的内容；(3)出版了漆侠主编的《宋代经济史》、高敏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郑学檬主编的《中国赋役制度史》、祝慈寿的《中国古代工业史》、刘广生主编的《中国古代邮驿史》、张泽咸的《唐五代赋役史草》、李锦绣的《唐代财政史》上卷、张弓的《唐代仓廩制度初探》等一批经济史、邮驿史著作，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军事后勤保障的方式如军费、军粮的来源、供给、转输和财务管理、仓储系统及邮驿制度等等。军事经济史与军事后勤制度史的关系更为密切，近年来出版了库桂生、姜鲁鸣的《中国国防经济史》、张振龙主编的《中国军事经济史》、王其坤主编的《中国军事经济史》等；(4)发表了一批关于军事后勤史和军事后勤制度史的论文，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以上所述都是笔者所见我国学者直接或间接地在有关军事后勤制度的研究领域内长期辛勤耕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是我们今后继续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无庸讳言，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研究，无论是从其本身要求而言，或相对其他专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看，都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差距：历代军事后勤制度的许多重要资料尚未发掘整理或充分利用；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尚未充分揭橥；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的科学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各代军事后勤制度及其重要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参差不齐，有些还是空白；至今还未出版一部系统的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或断代军事后勤制度史；中国后勤制度思想史的研究基本没有展开；至于军事后勤制度与其他军事制度以及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民族、地理环境、军事、历史传统等等制约其发展的诸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这种状况，显然是不能适应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的。

就学科属性而言，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是军事制度史的一个分支，同时它又是军制学、军事后勤学、政治学、经济学（特别是军事经济学）历史学各门学科知识的综合。可以说，它是一门具有边缘学科性质的三级学科（军制学—军制史—军事后勤制度史）。我们要开创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只有认清其学科特征，才能正确把握这一分支学科发展的方向和途径。为此，我们应提倡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吸收军制学、军事后勤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各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阔视野，拓宽领域，从而丰富和深化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的研究。

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前后绵延四千余年，历朝历代的军事后勤制度各有特色。为了推进这门学科的研究，我们必须把宏观研

研究与微观研究、系统研究与个案研究、通史研究与断代研究、专题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目前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作为一门分支学科还处在起步阶段。在这个时候，组织力量编写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无疑是必要的，可以借此总结前一阶段学术界分散于论著中或其他相关专题研究中的学术成果，加以系统化，初步建立本学科的科学体系，并在某些方面力图有所前进或突破。但是，与此相比，系统地全面地发掘和整理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的大量文献和考古文物资料，开展深入的具体的专题研究，把制约和决定军事后勤制度发展演变的诸因素，把军事后勤保障的组织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后勤保障的内容和方式，把军事后勤制度对军事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把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在军事后勤制度建设上的贡献等等，予以科学的生动的揭示和阐述，这对于推进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的研究，尤其是催化这门尚在摇篮之中的分支学科的成熟，似乎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本卷的写作，只是在充分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为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勾画一个粗浅的轮廓而已，开创中国军事后勤制度史新局面的任务有待来者完成。

军事后勤制度史的内容十分丰富，大体应当包括关于后勤保障体制、后勤保障内容、后勤保障方式诸方面国家制定和施行的法律、法令、条令、条例、章程、规则等一整套规范体系及其具体实施情况。结合中国历史的具体特点，古代后勤制度史应包括中央和地方后勤管理机构及其职能，军费、粮秣的筹集和供给制度，武器装备的生产和管理制度，马政和交通运输制度，以及卫生保障制度，等等。关于古代军事卫生保障制度的记载十分阙略，本卷未能展开论述，这是十分遗憾的。关于古代交通运输制度，只在论述马

政或通讯联络制度时涉及，语焉不详。一般来说，通讯联络制度并不隶属于军事后勤制度，但在古代却又与军事后勤制度没有严格分离，尤其是与交通运输制度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民国初期通讯兵还列入后勤保障编制之中。考虑到本书各卷均未设立专章论述这一制度，而它又是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本卷将它与马政并为一节论述。我们想对于本卷在编写内容上有所增减的安排，广大读者是能够理解的。

本卷是一部在主编主持下，分章执笔，统一定稿的集体著作，若有论述不恰当、体例不完备、材料不翔实及其他缺陷，概由本卷主编负责，祈望学术界的师友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注释：

《孙子·军争篇》。

《诸葛亮集·治军第九》。

洪学智：《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后勤工作而努力奋斗》，《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

⑧孙秀德主编：《军事后勤学》，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该书将后勤历史划分为三个部分：古代后勤、近代后勤和现代后勤，指出“这也不过是为了研究方便而进行的一种划分，历史本身并不呈现出各时代之间的严格界线”。该书分析了古代后勤、近代后勤、现代后勤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特点。

⑥⑨ 库桂生、姜鲁鸣：《中国国防经济史》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该书以作战工具的发展阶段为依据和基本线索，将中国武器装备和国防经济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并分析了各个时期的基本特点。笔者认为该书的划分标准